

# 一个少女的日记

#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

根据英译本1977年纽约第77次印刷的袖珍本译出

## 一个少女的日记

〔荷〕安妮·弗兰克 著

刘 舒 译

责任编辑：欧阳捍卫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，210,000 印张，11.125 印数，1——97,000

统 书号，10109·1593 定价，1.00元

## 译 者 前 言

《一个少女的日记》是一部真实的笔录，记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荷兰在纳粹德国占领下人民的生活和斗争，由于是一个少女动人心弦的内心自白，所以具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。在国外一些报刊上，被誉为当代名作。

这部日记的作者安妮·弗兰克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时，和她的父母、姊妹以及其他的人一共八个，在荷兰首府阿姆斯特丹一座楼上后部几间朝北的房间里（即日记中所称“密室”），过了两年多避难的隐匿生活。八个人都是犹太人。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实行种族迫害，猖狂到对犹太人采取绝灭措施。八个犹太人在他们忠诚的荷兰朋友们冒着风险的帮助下，过了两年多与世隔绝的禁锢生活。安妮的日记除了开始部份之外，都是在这座楼上的“密室”里写的。日记从1942年6月写到1944年8月。灾难终于降临，盖世太保袭击了“密室”。八个犹太人连同援助、保护他们的荷兰朋友们都遭了难，被关进集中营。安妮的日记，在“密室”遭受袭击搜查时，被盖世太保当成无用废纸扔在地上。事后，几个幸免于难的荷兰朋友在

乱纸堆中发现了，收藏起来。1945年1月至3月期间，安妮的母亲、姊妹在集中营先后去世，不久安妮也病逝。1945年5月，纳粹德国崩溃，战争结束。安妮的父亲奥托·弗兰克幸得生还，荷兰朋友们便把安妮的日记交给了他。

奥托·弗兰克为了纪念亲人，把日记打印出来，在朋友间传看。后来在一位荷兰教授的鼓励下，这部用荷兰文写的日记，略经删节，便在1947年第一次公开出版。

这部日记出版后，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。在战后数十年间，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。据日记英译本1975年纽约第七十七次印行的袖珍本《后记》中不完全资料看，仅仅精装本销售数就达一百万册，普及本、袖珍本五百五十万册，加上大型版本，以及书刊上的节写，估计读者超过一千万人。这部日记还被改编为剧本、广播剧、动画片等等。1967年又拍成电视片。剧本在美国纽约和德国、荷兰等国的许多城市上演过，获得巨大成功，并多次获奖。

乔治·斯梯芬在日记英译本《前言》中说：这部日记记下了一个惊险、悲壮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人类精神获得胜利的象征。希特勒声嘶力竭地吼道，我的使命是毁灭一切，而纳粹德国的一切宣传机器都在播送他的声音，全世界都能听到。就在同时，安妮静静地微笑着说，我相信人的善良。她在小小的日记本里记下她对自己的心灵说的话，而那本日记，是不给别人看的，只有她自己一人看。

德国作家欧恩斯特·斯赫纳倍尔说：“几百万人的声音曾一度被压下去，但是安妮的低低的，只不过是小孩子

的悄悄话……却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，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。”

这是一部没有豪言壮语的英雄故事。一个女孩子在一个红格子花布封面的日记本里写的“悄悄话”，的确成了一部不朽的作品。

安妮在“密室”中度过她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年月。这是一个少女身心迅速变化的时期。在那门窗紧闭，足不出户，而且时时有被搜捕危险的三年漫长的日子里，安妮这个年轻生命，以异乎寻常的生机，像岩石缝中的一棵小树苗，顽强地成长起来。从这部日记中，能清楚地看到这个成长过程中的特殊艰巨的挣扎。

安妮不仅对胜利始终抱着不容置疑的信心，在震得楼房也颤抖的炮火中，始终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而且在死亡日日夜夜威胁之下，竟有那么强烈的生之意志。那因渴望自由而痛苦的心灵，竟发现那么多希望，那么多生活的情趣，感受到那么多生命的欢悦。日记里处处流露着这个感情热烈、蕴含丰富的少女的无比聪慧和过人才情。她那支活泼、诙谐的笔下，处处使你神驰，使你忍俊不住，莞尔而笑。

她孜孜不倦地学习，读历史、学文学、学外文，希望在战后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新闻记者。她不断地和幻想中的知心朋友凯蒂（日记）谈心、讨论，探索着社会、人生的种种问题。这个不满十五岁的少女对生活的洞察，超越了“密室”那极小的天地，超越了她所处的战争年代。她细心观察着这一群精神境界高低不等的普通人，写了他们的高尚，也

写了他们的平庸。她写了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，从侧面反映了法西斯迫害下人性所遭受的扭曲。人们挤在狭小角落，几乎没有各自必要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条件，正常关系也自然受到损害。但是难能可贵的是，在这方面，安妮依然严格地解剖自己、纠正自己的偏颇。此外，她还写了自己初初萌发的爱情，和对待爱情的一丝不苟的严肃。

在那几乎不能动弹的“密室”里，安妮就是这样过着一种十分丰富的生活，全然无视那始终守候在旁的死神。

日记发表以后，数十年过去了，至今仍然这么扣人心弦，发人深思，因为安妮那热爱生活，不屈不挠地探索生活真谛的精神，依然和我们息息相通。现在把这本书奉献给我们广大青年读者，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共鸣。

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

6月12日(星期五)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早晨六点钟我就醒来了。醒得那么早也不奇怪，但是当然不会允许我那么早就起床。我真想赶快起来，去看看生日礼物，可是我还得按捺下好奇心，挨到六点三刻才起床。这时我再也耐不住了，一起来就往餐室跑，摩捷（我的小猫咪）在那儿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欢迎。

七点钟一过，我立刻跑到爸爸妈妈房里，然后奔进起坐间，打开生日礼物。第一个向我祝贺的就是你呀！你，真是最精美的礼物啦！桌上还有一束玫瑰、几枝芍药和一盆花。那天，还有不少美丽的花送来。

爸爸妈妈给我的东西真不少。朋友们也把我宠坏了，送给我这么多礼物！有映画的暗箱、集体游戏机、糖果、巧克力、智力玩具、胸针、一本约瑟夫·柯亨编的《荷兰民间故事》、一本戴西著的《山区的假日》（是一本恐怖小说），还有钱！我可以去买《希腊和罗马神话》了——太好啦！

莱丝来叫我，我们一同上学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拿出甜饼干款待同学们。大家吃过又继续上课。

现在我得停笔了。再见！我要和你做好朋友了！

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

星期日下午为我举行了生日舞会，放了一部电影《灯塔看守人和琳丁丁》<sup>①</sup>，同学们看得高兴极了。这一天过得真美妙，男女朋友来了一大群。妈妈总想知道我心爱的人是哪一个。她一点也没有猜到是彼特·韦塞。妈妈这个心思，有一天，一下子就叫我给掏了出来。我脸都没有红一红，眼也没有眨一眨。我和莱丝·谷萃、姗妮·豪特曼要好已经好几年。后来我上犹太中学，又认识了约贝艾·德·华奥。我们常常在一起。她是最要好的女朋友。后来，莱丝和另外一个女孩更要好。姗妮不久转到别的学校去了，在那里又交了新朋友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琳丁丁 (Rin-Tin-Tin) 是二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的所谓“大明星”。



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

好几天没有记了，因为对于写日记这件事，我还得先好好想一想。我这样一个人要写日记，简直是个奇怪念头，不只是因为从来不曾写过，还因为我感到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内心剖白，恐怕没有人会感到兴趣，就是我自己，都不会感兴趣。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写，尤其想把埋在心底深处的一切都倾吐出来。

俗话说：“纸笔胜似知心朋友”。我回忆起从前我那些含着淡淡的忧郁的日子里，有一天我手撑着脸颊坐着，闷闷不乐，没精打采，是出去走走好呢，还是呆在家里，也拿不定主意。那时，这句话就来到我心里。是呀，纸笔的确胜似知心朋友，能始终静听你倾诉一切。这个硬壳笔记本，封面上印着一个怪神气的名字：日记。我并不想把它给谁看，所以或许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它；除非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，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。现在说到事情的根本上来，我写日记的原因是：我并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朋友。

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吧，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

的女孩子竟会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，事实上我也并不孤独。我有亲爱的父母亲，有一个十六岁的姐姐。我认识的算得上是朋友的人大约有三十个——小伙子朋友有一大串，他们都热切地盼望看我一眼。盼不到，就在教室里用小镜子偷偷看我。我还有亲戚——舅舅、舅母。他们都可亲可爱。有这么美满的家庭，我好像并不缺少什么，可是朋友们在一起，除了说说笑、打打趣以外，再没有什么了。谁都是一样。我们不能谈论任何超出日常生活范围的事，似乎不可能更亲密一些。我的烦恼就是这样来的。也许我对人缺乏信任，可是严酷的现实使我不知道怎么办。

我的日记就这样产生了。我把日记看成我的朋友，我称她作凯蒂。我久已期待着她，我希望她的面影时时都清晰地在我心中出现，所以我不愿意像许多人写日记那样，只记下一连串枯燥无味的事，我要她倾听我谈心。

在我开始给她写信时，必须先把我自己的情况简单说说，虽然我不大想说，可是不得不写几句，否则突然开始，没头没脑，写的是些什么事情，谁也弄不明白。

我的父亲是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和母亲结婚的。那时母亲二十五岁。姐姐玛格特于1926年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。接着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。我们是犹太人，在希特勒的压迫下，不得不在1933年迁居到荷兰。父亲在特拉维公司当经理。这个公司和柯仑公司有密切关系，都设在一座大楼里。父亲是柯仑公司的股东。

我们家里其余留在德国的人们，在希特勒反犹太人的条

例的压迫下，整日惶惶不安。1938年，犹太人遭到大屠杀以后，我的两个舅舅就逃到美国去了。外祖母来到我们这里。她那时七十三岁。1940年5月以后，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。战争降临，法西斯德国进攻，荷兰停止抵抗，德国人占领了荷兰，那时是我们犹太人受难的真正开始。反犹太人的条例接二连三地发布。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一个黄色六角星标志，犹太人必须交出他们的自行车。犹太人禁止乘火车，禁止使用小汽车。犹太人只准在下午三点到五点钟之间上街购买东西，而且只能在挂着“犹太商店”牌子的店里买。犹太人在晚上八点钟必须回到房屋里。八点钟以后，即使在自己的小花园里坐坐也不行。犹太人禁止到剧场、影院、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去。犹太人不许参加竞赛活动。游泳池、网球场、曲棍球场、以及其他各种体育活动场所，对犹太人都是禁地。犹太人不能到基督徒家中作客，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。类似的禁令可多啦。

于是我们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许做，虽然如此，生活依然进行着。约贝艾常常对我说：“你不管干什么事，都战战兢兢的，因为样样事都可能犯忌。”我们的自由给剥夺光了。可那时总算还能忍受。

1942年外婆去世。没有人知道我多么忆念她，多么爱她。

1934年，我进了蒙特索里幼儿园，一直在那里几年。我在6B班那一学年结束时，就得向老师K女士告别了。我们都哭了。多么悲伤的离别啊！1941年，我和姐姐玛格特一同

进犹太中学。她上四年级，我上一年级。

直到现在，我们一家四人，一切总算还好，一直都住在这里。

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

亲爱的凯蒂：

此刻一切是这么安静，我立即坐下来，给你写信，妈妈和爸爸上街了。玛格特和朋友们打乒乓去了。

最近我常常打乒乓球。我们乒乓球手最爱吃冰激凌，特别是在夏天，打完了，就到附近的特尔斐或奥西斯冷饮店去。这些地方允许犹太人去。我们都不用自己掏零钱了，因为奥西斯店里，顾客经常是满满的，我们的朋友又多，我们总能在哪里遇见一些好心人或者小伙子朋友，他们请我们吃的冰激凌，比我们一个星期吃的还多。

我想你一定很奇怪，我小小年纪，就谈论起小伙子朋友来了。可是这在我们学校里，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。一个男孩，只要一开口问愿不愿意让他同我一路骑车回家。只要我们刚刚开始讲话，十有八九，我敢说，就会一下子连头带

脚掉进爱情里，那痴痴的目光再也不肯转开去了。当然过一会儿，就冷静下来。特别是因为我丝毫也不去注意那些热情的目光，我只是高高兴兴地踏着自行车跑着。

事情要是到了他们开口说“问问父亲的意见”的时候，我就在车上轻轻一扭身，书包便掉下地，那小伙子只好停下车，去把书包拎起来递给我。这时候我就说些别的事岔开话头。

这些是最天真无邪的一种人。还有一些抛吻的，想挽住你的臂膀的，这些哥们儿当然要碰钉子啦！我把车一蹬，跑得老远，再也不让他们陪我一起走了。要不然我就假装受到冒犯，毫不含糊地要他们走开。

亲爱的凯蒂，我们的友谊基础已经打下，明天见。

1942年6月21日 星期日

亲爱的凯蒂：

我们B 1班全班都紧张得发抖了，因为教师会议立刻就要举行，将要讨论谁升级谁留级。坐在我和梅普·德·琼后面一排的卫姆和费克斯这两个小伙子真有意思，他们在假期里，只晓得玩赌博，玩得一个弗罗林<sup>①</sup>也不剩，可是今天从

---

<sup>①</sup> 弗罗林 (Florin)：荷兰银币。

早到晚两人都一个劲儿地念叨着“你要升级，”“不会”，“会的！”梅普要求他俩安静些，我气得也发了火，还是不能使他们安静下来。

依我看，班上四分之一都应该留级。有些人完全是笨蛋，但是老师是世界上最最难捉摸的人，这一次他们也许会做得对一些吧。

我并不太为自己和女朋友们担心，我们是能勉强通过这场考试的，虽然我的数学究竟怎样还不太有把握。我们也只有耐心等待着，互相说着鼓励的话。

我和老师们相处得很好。一共有九个老师，七个男的，两个女的。数学老师开普特老先生一直对我感到头痛，因为我的话太多，就为这个原因，他罚我做一篇作文，题目叫做《话匣子》。话匣子！怎么写呢？不管怎样，我决心下了课以后再去琢磨怎么写。我把题目记在笔记本上，在课堂上我尽力保持安静。

那天晚上我做完了别的家庭作业，目光落到笔记本上那个题目上了。我一边咬着自来水笔杆，一边想，谁都能在纸上写几行又大又稀的字，胡诌一篇废话，可是要充分证明爱说话是必要的，还是很难的。我想呀，想呀，忽然灵机一动，一个念头冒了出来。我就照指定的三个方面写，觉得很满意。我的论证是：爱说话是女性弱点，所以我愿尽最大努力加以克制。可是我这毛病是永远也治不好的，因为我的母亲和我一样爱说话，也许说得比我还多，那么，对这种遗传因素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这种辩解使开普特先生也不能不

笑。下一次上课，我继续大发议论，另一篇作文接着又来了。这次的题目是《关不住的话匣子》。我把写好的那篇文章交上去。这一来，开普特先生足有两堂课没有抱怨我，但是在第三堂课上，他又受不了啦。他说：“作为对饶舌者的惩罚，安妮还要做一篇作文，题目叫做：《蛤蟆嘴太太说：呱！呱！呱！》教室里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，我也得笑；可是我觉得用这个题目作文章，我的才能已经用尽，必须想别的办法对付，想个完全新鲜的办法才行。很幸运，我的朋友姗妮诗写得很好，她愿意帮助我把这篇作文全部写成诗体。我高兴得跳了起来。开普特先生想用这个滑稽的题目取笑我，我得挽回我的损失，把他变成全班的笑柄。诗写成了，写得好极啦！写的是鸭妈妈和天鹅爸爸有三个鸭宝宝。鸭宝宝们被爸爸打死啦，因为他们太爱说话了。幸好开普特先生明白了这个笑话。他竟在班上高声朗读了这首诗，还加以解释，后来又拿到别的班上去读。

从此以后，允许我讲话了，也不再叫我做额外的作业了。开普特先生还时常把这件事当笑话讲呢。

你的，安妮

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

亲爱的凯蒂：

天热极了，我们真的快烤化了。但是在这样的热天，我不论到什么地方去，都只能步行。这时要是能乘上电车，我一定能充分领略那种美妙，但是这种奢侈，是犹太人禁止享受的——步行对我们来说，够好啦！昨天中午，我到简·拉肯街牙科医生那儿去。从我们学校那条斯大支丁莫吐仑街走去，要走很远。幸亏牙科医生的助手心好，给了我一杯水喝——她是属于善良人那一类的。后来我又走回学校。下午上课时，我因太累差不多睡着了。

允许我们乘渡船，这就是最高优待了。一只小船从约瑟夫·以色里凯德驶来。我们刚开口招呼，船上的人就来接我们上去。我们的不幸处境的确不能归咎于荷兰人民。

我真不想上学了，因为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假期中被人偷去了。妈妈的车早就给爸爸送到一个基督教人家去保存着。谢谢上帝，快放假了，没有车骑的痛苦，还有一星期就将过去。昨天遇到一件有趣的事。我经过自行车棚的时候，听见有人招呼我。我四面望望，看见前天在女朋友依娃家中



遇到的那个漂亮小伙子。他不好意思地向我走过来，自我介绍说，他的名字叫海雷·戈保。我有些惊讶，不知道他有什么事，可是不用我等多久，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让他和我同路上学。“好的，反正你和我总要同一段路的！”我同意了他，就和他一块儿走。海雷十六岁，会讲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。今天早上他又等我一同走。我希望他从今以后，每天都跟我一同走。

你的，安妮

1942年6月30日 星期二

亲爱的凯蒂，

直到今天，一直没有时间给你写信。星期四一整天，我在朋友们那儿，星期五有客人来，所以直到现在才来写。海雷和我只一个星期就很熟悉了。他告诉了我很多他自己的情况。他是独自一人到荷兰来的，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他的爸爸妈妈在比利时。

海雷以前有一个女朋友，名叫芬丽。我也认识她，是一个又温柔又有些儿呆板的人儿。海雷告诉我，他遇见我才觉